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研讨会论文集

一石千浪

张应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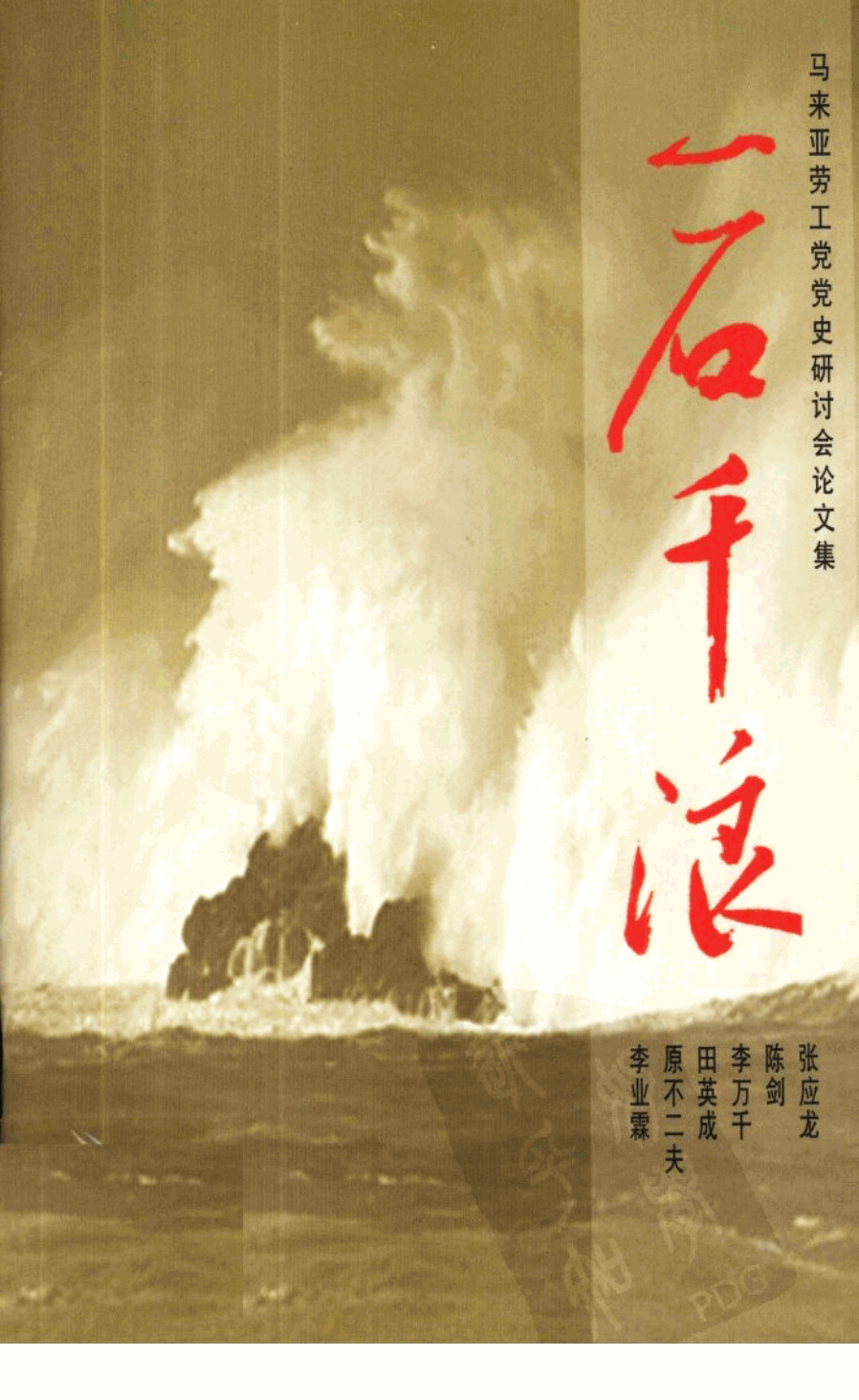
陈剑

李万千

田英成

原不二夫

李业霖



承先启后·再绽光辉 2~3

陈凯希



导言 4~5

陈剑虹

严谨详实·引发思考 6~8

李业霖



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 9~11

原不二夫

战后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发展 12~23

田英成



马来亚劳工党与宪制斗争 24~32

李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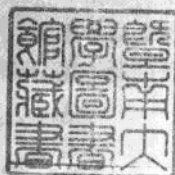
浅谈意认形态与劳工党的斗争 33~46

陈剑



附录：时空对话与历史视野 47~52

张应龙



出版者：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主 编：陈剑虹

承印者：Percetakan Kum Sdn Bhd (21648-U)

承先启后·再绽光辉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推展礼欢迎词

● 陈凯希

今天趁著佳节连接降临，我们老友在这里举行简单的聚餐交流会。承蒙大家热烈参与，尤其是新山的二百位同志，赶到浮罗交怡观光归来，路经吉隆坡歇脚，也借机会踊跃出席，我要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另一方面，我也要借这个欢乐时光，向基督徒朋友恭祝圣诞快乐，向马来族朋友恭贺 Selamat Hari Raya 以及向每一个人在新千禧年开头的 2001 年，有一个愉快、繁荣进步的新年。



依照原来的计划，我们安排在天后宫展开我们的活动，节目包括《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推介礼，并且邀请了国内外数位史学家前来谈谈劳工党在五六十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但由于局势微妙，气氛不大好，促使我们改变原定的计划。不过，即使我们改换了地点，我们也要珍惜今天难得的相聚交流的机会。

马来亚劳工党活跃于 1952 年至 1972 年间。虽然是短短的二十年，却是轰轰烈烈的二十年，闪烁著耀眼夺目的光辉，也面对无数残酷的挑战和打击。劳工党当时是为国家的独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目标进行奋斗。我们纯洁的理想获得无数热血青年的积极和无私的参与。我们走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血泪斑斑、可歌可泣的路程。虽然我们的奋斗已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目标，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肯定了我们以往所扮演的角色。唯一的遗憾是，种族主义还是大行其道，这跟当年劳工党提倡的非种族主义路线大相径庭。所幸的是有一批新生代的崛起，以国家民族为重，不以种族主义眼光看待问题，他们是国家

的希望。

劳工党的二十年奋斗，有她的理想，有她的目标；对社会，对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目前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热切期望一本完整的劳工党历史的问世，展现劳工党的真实面貌，对参与劳工党斗争的人有一个交代，并且发挥承先启后的作用，也给后人一个借镜。

我们原本打算隆重的推出这一部书，并且举办一个研讨会，以志其盛，但因为前述的原因，只能低调处理推介的工作。今天，我们国家面对的问题还是如何加强民族和谐，如何塑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问题，以共同改革种族社会结构，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劳工党的同志曾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牺牲，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热血沸腾的奔走呼号，献出自己的青春。虽然劳工党在1972年便被撤消注册，但是劳工党同志长期以来，还是保持昂扬的斗志，在各自的领域为民族、为社会默默的作出贡献。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并且将之视为一种荣誉，一种骄傲，因为每一个人都曾为自己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和谐、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作出重大的牺牲贡献。

今天趁著新千禧年降临之前(昨天的报章报导英国名科幻小说作者克拉克坚持2001年是第三个千禧年的开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别有一番意义。我们老友应继续散发生命的光与热，在人间建立温馨和平美好的社会。

在有生之年，如果大家都能保持著热心和希望，就能创造有利的条件，让大家继续有著相聚交流的机会。希望大家保持过去劳工党的精神，为这个国家和人民造福。

最后，我衷诚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导言

● 陈剑虹

2000年12月31日，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在首都吉隆坡举行《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的推展礼，并计划以研讨会的形式专题讨论几项相关的学术课题。由于难以预见的客观因素，研讨会被迫取消。

这个集子收入的是原定在研讨会上呈现的书评和论文。今天辑录出版，目的在于广为流传，并收抛砖引玉之效。



集子的第一篇书评由大马著名史学家、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业霖先生撰写。李先生以他一贯绚丽的文字风格，客观地评价《劳工党斗争史》的三大优点：（一）史料丰富；（二）叙述详实；（三）语言朴质。他也实事求是的指出本书在剪裁上的缺陷，并以宋朝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为例，要求历史著作凝练准确。

国际友人，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原不二夫教授的第二篇书评则从原书内容入手，以民主集中制、语文政策、斗争路线作为讨论重心，剖析劳工党当年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并将之和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作一比较，得出结论说：“一个真正诚心把自己奉献予人民的政党，应该继续成为反对党，以坚持的保护人民的权益，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权益。”他也对劳工党在一些政策实践上之忽视马来群众，语重心长地给予批判。

砂劳越资深报人，中国南京大学研究学者田英成先生梳理资料，广搜口碑，写成《战后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发展，1946～1970》，聚焦于砂共和人联党间的相互关系，并勾勒出其消长对左翼运动的冲击。文章将人联党历经打压后，仍旧坚持议会斗争路线

一举和劳工党退出议会杯葛大选的决定作出简析，颇发人深思。

时事评论员兼工委顾问李万千同志的《马来亚劳工党与宪制斗争》阐述劳工党从社会民主党激化为工人党的背景与过程。论文解读了宪制斗争的渠道被堵塞后，劳工党在国内外政治气候影响下，走向群众斗争的必然性。结论则对劳工党人的重新整装再出发问题，表达了应该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的看法，认为是值得鼓励的。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意识形态泛指它的政治哲学、政纲取向与政策方针。它指导政党在斗争议程上的策略，也规范党员的集体思想与行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陈剑（陈松沾）即从这一角度切入，对劳工党的历史发展作出分期，并对各阶段的斗争路线和策略口号作深湛的分析。他对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党内外极左思潮的泛滥归之于中国文革的影响，以及马共肃反运动的外延，这导致了党纪的失控与党风的过激，乃至党组织的最终被宣布为不存在，不能再继续扮演它的政治角色。

广州暨南大学张应龙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号《人文杂志》上的书评，对劳工党有诸多溢美之词；并说劳工党的历史是斗争史，也是建设史。我们征得了作者的同意，附录于书末，自勉勉人。

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推崇“求真”和“直书”的史德。史学家们根据确切的史料，秉笔叙事议人，以求完善化历史科学的揭示性、教育性和借鉴性社会功能。清章学诚说：“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谏其事。”主张依个人才识辨析史实，对历史作出议论或判断。

在这样的学风认识基础上，我们期望当代的历史工作者能够凭群力创造一个无所畏惧的探索环境，重建战后大马的左翼运动历史，让百花齐放在史学的园圃里，让Clio的精神遗产永世长青，让左翼运动的奉献与牺牲彪炳史册。

严谨详实·引发思考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述评

● 李业霖

马来亚劳工党成立于1951年，迄1972年党的注册被吊销，从此就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马来亚劳工党走了21年崎岖而光辉的战斗历程，对争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自由平等、反帝反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述往事，思来者”是司马迁概括了历史的功能与服务人类的作用。现在由朱齐英先生等人总结了马来亚劳工党21年的奋斗历史经验，出版了《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我热烈欢迎这部本国政治史的力作的问世。这是马来西亚史学史上值得庆贺的喜事，我很愿意借此机会表示我个人的敬意。

本书概述了从1951年5月至1972年7月的21年间，劳工党在建党前期，探索理论和摸索定位；建党之后，领导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进行宪制民主的斗争以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曲折前进的历程。四、五十年前的马来亚正处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时期，人民过著艰苦的生活，水深火热，螭蟾沸羹。先进的人们为了改变现状，努力奋斗，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建立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他们努力奋斗，坚苦卓绝，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他们做了怎样的奋斗和牺牲？他们有的在监牢里枯萎了他们美丽的生命花朵，有的甚至鲜血滴流。本书通过图片资料和文字叙述，提供读者们有关劳工党历史一个清晰的概貌。

本书记述劳工党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重大事件发生的经过。它描绘了劳工党和人民党1957年联合组成马来亚人民社会主

义阵线，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在主观上，策略的不能配搭，在客观上受到敌对集团的渗透和破坏，终于分道扬镳。其后，一度有复合的机会，但终又不能落实。生活在21世纪初的马来西亚青年，回顾前人经历过的千辛万苦的英勇奋斗的历程，应蓦然有所警惕，从而产生工作热情和力量，为当前马来西亚伟大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认为，马来亚劳工党党史最难著墨的恐怕是其后期的一段史实。由奉行议会民主制度转向杯葛大选，走向街头。这是一个大蜕变。党内各级领袖一个个被逮捕，锒铛入狱，以至群龙无首。也许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一些党领袖以极左姿态出现，言论偏激，跃跃欲试，这样就造成路线之争。加上敌对集团派遣代理人渗透分化，造成极度混乱、恐怖的局面。凶终隙末，分崩离析，犹如一棵大树被虫蚁蛀食，根败叶枯，党的力量，无法再凝聚起来了。

在这里我简单扼要地说出对这本党史的看法。它有几个优点：

第一，史料丰富，叙述周详。作者在文献、史料的选择上，下过一番工夫。参考书上，列出25种文献资料。在访问昔日的党要元老，阅读陈年的报章杂志，沙里淘金，缩龙成寸，孜孜矻矻，兢兢业业，潜心撰写，耗尽精力，功不可没。

第二，忠于历史真相。2000年写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有许多方便，不必为当时的是非为是非，秉笔直书，不必虚美，不必隐恶，和盘托出。相信当年的老同志看了，也会追怀往事，如见故人，感慨系之。

第三，可读可取可信。本书的第三个优点，是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又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所以然，夹述夹议，新意迭出。除了不厌其详罗列冗长的条文外，读起来很少沉闷之感。

当然，这部史书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我认为本书有不足之处，是剪裁工夫做得不够。如讲建党的背景，铺述得太广泛，应该精要一点。一些问题叙述得太详，若写得精简集中一些，就会更精彩。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但要论从史出。论断的语言要有概括力，而且要准确。

说到剪裁工夫，不妨拿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来比论一下。《资治通鉴》所采用的文献，“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他对史料的选择、删节非常讲究。他的三位助手收集整理资料约九百卷，共一千多万字，他花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删成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之所以能编写成功，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是剪裁得体，叙事井然，不漏不烦。

自古文人多，良史少。历史文章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真不容易。但从基本要求来说，要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而文字要准确、凝练、生动形象。《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行文流畅，明白如话，可读性很高。

我认为本书是一部可信可读的党史，是一部严谨切实的史著，成一家之言。我们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值得推荐给大家阅读。



▲ 陈凯希（左）、巴古南（左二）、朱齐英（右二）及拉惹古玛医生（右）在《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推展礼上欢愉交谈。

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述评

● 原不二夫

我只不过是一个浅识的历史学家，没有真正实践过维护人民权益的行动；可我由衷的尊敬真诚为人民而斗争的人士。我实在没有权利评估马来亚劳工党伟大的历史，不过由于工委会的先生们的热情招待，我这里就提出一些浅薄的意见。



《劳工党斗争史》是一部非常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由政党所组织撰写的党史，一般上都有指责党内被击败的对手，并把一切过错和严重的失误归咎于这对手的倾向。但是这一部历史把党的主流派和异议者的目标并列，并且并不偏颇地斥责后者。对于那些从事反党活动而遭开除党籍的领袖，它也公允地加以对待。他们当日积极领导人民的活动事迹在书中获得应有的叙述。对于党史写作，特别是左翼政党来说，这该是罕有的个例。

有关马来人及印度人政治家，以及非华人组织的名称如果能够配以原名的罗马字拼音，那会更为方便读者的阅读。

在内容上，本书第74页对于泛马劳工党中央委员会之谴责共产极权主义，及其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政治路线有所批评。无论如何，我们得指出世界上大部份共产党都曾产生独裁者。苏共的斯大林、中共的毛泽东和马共的莱特都属此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例，民主集中制即是营造这一体制的中介。不过，马来亚劳工党的全国主席和总秘书都不曾是独裁者。他们极易遭受批评和开除。这显示劳工党在党内奉行民主，它绝无意建立一个独裁的共产国家。如果劳工党有缘执政，它极可能是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权，让每一个

异议分子更能自由地批评劳工党政府。

在第542至574页，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上，劳工党中央认为以马来人特权为具体表征的种族主义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大部份的马来农民在未来都会反对这项种族主义政策。事实是，马来人特权在过去的几十年并没让所有的马来人获益，在许多人还是被抛掷在后头，他们现在应该感到幻想已经破灭。不过，在有关语文问题上，没有任何马来人认为马来文不该成为国家语文。至今还有众多的马来青年无法接受大专教育，但是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政策，而不是国语政策所致。

另一方面，新加坡社阵却坚持说只有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施行语文平等。不过，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包括社会主义政府，能够达到这一理想。正因如此，语文政策不能像其他政策般地以阶级观点作分析。我以为劳工党当时应该和既坚决又有远见地要求立马来语为国语的人民党谈商这一课题。有这样一个说法，言及傀儡政府的语文政策也压制马来语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联盟或国阵政府统治之下，马来文已经取代英文。它是不是意味著这政府已经不是一个傀儡政权？如果是这样，它在什么时候已经真正独立？

在宪制斗争及群众斗争的课题上，我可以了解当时劳工党的处境。在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它已经别无选择，而必须放弃合法斗争，转而采取非法的群众斗争方式。不过，我想如果劳工党能够执行即使是些微的宪制斗争方针，它也许会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许多1960年代后期的文告和政策声明建议劳工党应该更加投身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反美运动以及民族团结的工作中。与其走上街头示威，劳工党为什么不能更悄悄地把精力集中在这些活动上？

不论马来亚劳工党采取任何政治策略，它终也不可能取得政权。如果它继续成为一个不靠种族沙文主义取巧的政党，它极可能阻遏执政党的滥权。历史告诉我们，真正为被压迫、被剥夺的下层人民而献身的政党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而掌握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枪杆子出政权”是正确的。不过，在马来西亚这已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即使马共也承认这一点。

只有善于妥协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权，正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

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所显示般。当日本社会党的村山富市成为首相时，他也在基本原则作出大让步。所以，一个真正诚心把自己奉献于人民的政党应该继续成为反对党，以坚决的保护人民的权益，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权益。

1967年的劳工党中央声明说：“当前反帝反殖基本力量的华人群众，依然是这场语文斗争的主力。”如果这样的提法导致忽视马来人权益心态的产生，那它即是错误的。马共也在1941年说过当时的斗争主要力量是华人，因为他们有十多年的丰富抗日经验。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它说：“马来亚独立斗争的主力是马来人，因为华人的主敌不是英国，而是蒋介石反动政权和美帝。”1970年代，马共自我批评了这条种族歧视路线。

本书也不可避免的在一些名称和史实上犯下轻微的错误。第29页“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应是“新民主青年团”；“马来民族党”应作“马来国民党”；第32页1946年2月胡愈之等十君子遭驱逐出境，事实是胡愈之和十君子没有关系，他是于1940年自动返回中国。第34页“劳工总会”（PMFTU）应作“职工总会”（全马职工联合总会）；布哈努汀医生应作布哈努汀博士。第606页“马来西亚民主政治运动党”应该译作“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

马来亚劳工党维护马来亚劳动人民权益的光辉历史将永不熄灭，我对它始终深表敬意。



▲ 2000年12月31日老友聚餐交流会场面一瞥。

战后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发展

(1946 ~ 1970)

● 田英成

绪言

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澜壮阔的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是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愿望，反帝反殖的独立运动由此在东南亚的土地上展开。



经受过英国长期殖民统治的星马婆（汶莱、砂劳越与沙巴），在战后所展开的独立解放运动，冲击著殖民统治的政权。英殖民主义者为了继续在幕后操纵，确保其政治与经济的利益，最终成功将砂沙并入马来西亚的版图。尽管这一场左翼政治运动遭到无情的镇压，然而波澜壮阔的斗争及其所引起的回响，已写下了历史悲壮的一页。

砂劳越于二战后让渡予英国，成为英国殖民地。亚非诸多殖民地在战后，风起云涌争取独立运动，砂劳越不仅不因此成为独立国，反而纳入英帝国的版图。然而，也因为如此，砂劳越人民在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之后，与星马一样掀起了反帝反殖运动，这一运动促进了砂劳越人民民族主义意识的成长，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意识。

民族解放浪潮的冲击

中国的长期内战到1949年时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海外的左翼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激励，特别是在星马婆一带。左翼运动以华人为核心，他们在

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内展开了对当时英殖民主义者的斗争，马共潜入森林进行游击战，更为举世瞩目。

中共建政之后，共产党左倾思想明显影响了砂劳越年轻的华人知识分子，部份青年向往共产统治下的中国，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估计由1950年至1956年数年间返回中国的年青人逾千人。这一时期，青年中学生组织罢课行动，通过反殖民地主义展开斗争发展左翼力量，结果导致英殖民地政府采取镇压手段，封闭社团、报馆以及大逮捕，并且驱逐不需要人士返回中国。这是反殖运动的开始。1954年12月，砂劳越立法议会批准抽营业税。这项抽税有些竟高达1,000%，由1955年正月1日开始生效，一时华人社会群情沸腾。泗里街中华商会于圣诞节召开抗议大会，通过在新的一年里头十天罢市。民丹莪、诗巫、古晋紧跟于后。罢市稍后蔓延至民都鲁、美里乃至全州。各地代表齐集古晋，向当局表达不满。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声中，英政府被迫延迟实行新税率，设立调查庭，在两个月之后向立法议会提呈一份经过修正的法案，大大减低税率。这一事件，使华人在政治上有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新马所掀起的反帝反殖运动，正好给共产主义在民族运动的掩护下找到一个出路。五十年代开始，砂劳越已有砂劳越解放同盟的秘密组织，目的是反英反殖，并且企图建立婆罗洲三邦共和国。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共产党组织，并于1963年开始展开武装斗争；其成员主要来自华人社会，对砂劳越华人社会影响甚大。

随著新马反殖运动的热烈展开，砂劳越深受影响。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这个由李光耀领导的政党，原是靠著左翼职工运动起家。行动党提出的“反对殖民地统治，争取祖国独立”的口号，激励了砂劳越的反殖运动。

这一时期，马来亚的左翼运动也达到高潮，由马来亚劳工党、人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在1957年成立了广泛的统一阵线——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大家携手合作，把矛头对准马来亚联盟政权。社阵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在各级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不少国会与州议会的席位，并且赢得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

鼓舞了砂劳越左翼人士组织政党的热忱。

反大马运动风起云涌

在国内外有利的政治形势下，砂劳越人民联合党在1959年6月4日成立，开创了政党政治的先河。该党由一群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发起，之后受华文教育者与职工运动者大量参与，对该党带来很大的影响。党主席王其辉是一位银行家，秘书长杨国斯则是一位执业律师。在34名发起人当中，有数名职工运动者，他们是砂共的成员，在数年后参与砂共发动的武装斗争。人联党虽说是一个走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初期的党员有不少是伊班族的党员，但它基本上是以华族为基础的政党。

人民联合党在“建党宣言”揭示其成立宗旨：

- (一) 循宪制途径争取砂劳越独立；
- (二) 建立议会民主的政府；
- (三) 促进及确保各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改善劳动者和经济落后者的经济状况；
- (四) 维持各民族的和谐与团结。

人联党很快的发展成为砂劳越最大政党，在1962年9月该党已成立18个支部及34个分部，党员从1959年的3,627人增加到1962年40,400人。

由于人联党的迅速发展，英殖民政府感到不安。因此，便在1961年11月2日在立法议会通过《居住地限制法令》，企图对该党的发展进行钳制。这项法令剥夺人身自由，和限制人民参加政治活动的不合理措施。人联党于是展开了全州性的群众集会，反对这个法令的实施。

1961年11月4日晚上，在人联党总部举行了一个规模庞大、情绪高昂的“追悼民主死亡大会”，抗议《居住地限制法令》的实施，出席人数超过五千人。在诗巫、美里、成邦江及众多支分部所发动的群众集会，都有数千人参加，反对这项违反民主及不合理的法令。这项群众性的运动，展示了人联党广泛的群众基础，震惊了英殖民地政府。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建议由马来亚、新加坡、砂劳越、北婆罗洲(沙巴)及汶莱组成马来西亚,这就是大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这项计划的提出,不仅在于能更有效地应付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而且将通过新的宪制安排,使新加坡和北婆三邦获得独立。其次,新联邦政体之组织模式将平衡各民族人口间之差异,而且也符合巫统党内1956~1960年间对婆罗洲土著人民地位所定下的政策,承认他们为马来民族一部份。很快的,五邦的左翼政党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马来亚劳工党即时反应,提出当前的要务是大力推行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的合并,而不是马来西亚联邦计划。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秘书长杨国斯向报界声明:“实行五邦大联合,须在砂劳越独立后才能办到。我邦在跟新、马联合前,必须与北婆先行联合,由小联合达到大联合”。

1962年1月27日,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在吉隆坡精武体育馆举行。经过数日会议后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会议欢迎联合邦、星洲、砂劳越、汶莱和北婆人民各方面的紧密合作,并希望这种合作在未来的年头里,可以为此区域带来和平与安宁。……马来西亚的概念在会上受到考虑,会议支持汶莱和砂劳越代表所表示的明确态度,即马来西亚概念在未受到进一步之考验前,必先有英属婆罗洲三邦的自主权。……”上述公报由出席大会的政党首席代表签署,计(一)砂劳越人民联合党;(二)新加坡工人党;(三)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四)新加坡人民党;(五)马来亚人民党;(六)汶莱人民党;(七)马来亚劳工党。

尽管左翼反对党联合阵线对马来西亚作出激烈的反对,但英国政府已立意通过马来亚联盟政府积极进行此项计划。在砂劳越各民族当中,华族基本上倾向于反大马计划,并且取得部份达雅族的支持。1962年2月19日,葛波德民意调查团抵古晋,人联党发动了一个群众集会,人数逾1万2千人,反对组织大马的建议。接著全州各支部陆续举行反对的集会,并纷纷组成代表团晋见调查团,表达反大马的立场。这种声势浩大的反大马计划,震惊了英殖民政府,于是展开了逮捕人联党重要干部的行动,企图镇压反大马的声势。

1962年8月中旬，葛波德民意调查团报告公布，结论是：赞成加入大马的砂劳越人民比反对加入大马者来得多。然而人联党仍然进行反对大马计划，并且组成访问联合国代表团。1962年11月底，联合国书面通知，接受人联党在12月中的联合国会议上，听取他们反大马的申诉。代表团准备在12月初动身前往菲律宾和汶莱人民党的阿查哈里会合，然后，前往联合国进行申诉。不料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向联合国的申诉计划也因此而被搁置不能成功。

人联党所持的反大马立场主要是基于这是英国的一项阴谋。英国坚持要马来西亚接管华族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加坡，而马来西亚要以土著占多数的英婆三邦来抵消民族的不平衡；婆罗洲三邦的国家主义者对此都表示不满。砂劳越一百多年来是个有自己的人民和特征的政治单位，因此不愿意同其他国家合并，除非得到大多数人民同意。

砂共发动武装斗争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的浪潮，波及砂劳越和沙巴。英国向这弹丸般的苏丹国派遣大批军队，并有空军和海军参战，澳洲和纽西兰出兵镇压，东姑阿都拉曼也从马来亚派出一支200人的特种警察去汶莱。

经过数天激战，起义被镇压。12月20日，苏丹取缔人民党，解散了立法议会，停止实施宪法，对人民党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开始大规模的逮捕和迫害。

汶莱人民党起义，给英殖民地政府制造了机会，大肆逮捕砂劳越左翼人士，包括人联党的干部和砂共成员。1962年12月11日至16日之间，当局在砂劳越各省共逮捕四十八名左翼积极份子，当中有半数以上是人联党的中央委员与支分部主要干部。在风声鹤唳的紧急情况下，砂共领导人号召其成员潜往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准备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当时的苏加诺政权极力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印尼共产党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印尼为砂共提供从事武装军事训练的天地。